

《岁月》的解构主义解读

周双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12)

摘要：本文用德里达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对伍尔夫的小说《岁月》进行了新的解读。细读文本，发现作者在这部小说中体现了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颠覆，并且有意无意地解构了几组二元对立的模式--过去/现在，男性/女性，时间/空间，同时文中某些重要概念还存在意义的不确定性。正是这些解构主义的特点为后人解读伍尔夫的意识流作品开辟了新的道路。

关键词：《岁月》 解构主义 二元对立 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I1) **文献标识码：**

伍尔夫 1937 年出版的《岁月》是一部以时间为背景的随笔小说。这位生活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女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本文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与作者本身的经历有关，她成长于一个九口之家，家庭之间的矛盾以及她同母异父的兄长对她的伤害给伍尔夫留下了永久的精神创伤。作品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小说主要讲述了帕吉特家族三代人的故事，即：以上校帕吉特为代表的第一代，以帕吉特上校的七个子女、迪戈比·帕吉特两个女儿、马隆院长的女儿构成的第二代，以莫里斯的子女为代表的第三代。其中，第一代的人物构成相对简单，第二代人物构成阵容最强大，作为上下两代的夹层和过渡，这一代人经历维多利亚与爱德华时代的更迭，经历了一战，经历了英国妇女运动的第一次高潮，是历史的最佳见证者。第三代的人物则开始聚减。书中的十一位女性由于沉浸在漫长的历史中而显苍老，她们对生活的觉悟也随之发生变化。小说包括了十一个年份，岁月以这样一种看似无情的方式讲述了一种生活的现实。作者介绍了一个在小世界里各色人物的内心活动，对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人们的外在生活和内在心理做了较为准确的分析描述。

近年来这部小说引起了我国评论界的关注，学者们主要从女性主义、时间观、意识流等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细读文本后，发觉对该文本的分析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本文试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对其进行分析。

解构主义哲学思想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其解构主义方法是从批判对象的理论中抽出一个典型的例子，对它进行剖析、批判和分析，通过自己的意识而建立对于事物真理的认识：反中心，反权威，反二元对立（豪威尔斯：21）。解构主义的任务之一就是“颠覆文本中不对称的二元对立概念或等级秩序”（王先需：182）。

《岁月》的情节发展便是对小说中过去/现在，男性/女性，时间/空间三个主要的二元对立概念的消解。此外，解构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意义的不确定性或对终极意义的否定（张首映：433）。在《岁月》中，伍尔夫对其中涉及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少发表自己的见解，而是将其留给读者去思考。正如作品中“新世界”这一概念，作者并未给予它明确的界定或意义，而是留给了我们一个开放自由的思考空间。本文结合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分析伍尔夫的《岁月》，并从中揭示文本所呈现的深层问题：颠覆“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二元对立。

《岁月》起初为读者呈现的是一个顽固守旧、受封建传统束缚、令人压抑的旧社会。这是一个以帕吉特家族中的第一代人为主，以帕吉特上校为代表，以帕吉特家族的老房子为中心的英国封建社会。在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上层社会，父权制盛行，女性基本没有地位，只能是作为男人多附属品呆在家中劳作，而像帕吉特上校之类的男人则过着无拘无束的奢华生活。就拿帕吉特上校对其大女儿埃莉诺的束缚来说，在他在世时，埃莉诺哪也不能去，帕吉特上校作为英国传统封建文化的代表，严控她的自由。另外，从埃莉诺在主持家务时其弟

弟们却在学校里接受着良好教育，孩子们看到父亲回来时各种惊恐的表情，以及帕吉特上校对女儿花钱学音乐的不满，却对儿子马丁给予六便士作为学习进步奖等细节中，我们可以看出，这种充满各种弊端的封建家族制社会是缺乏自由，且无所谓公平的社会。其中喜欢冒险的小女孩罗斯夜晚骑马穿过街道的画面，以及书中多次出现的女性人们站在窗边向外张望的情形之类的细节描写都传达了人们对当前时代不满，及其对自由、平等的憧憬。传统的旧社会向自由的新社会过渡的转折点父亲的去世。父亲离世后，埃莉诺毅然将老房子卖掉，独自一人居住在一间工人公寓里，有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物质空间。从此她可以随时去看望她的亲戚朋友，可以出国旅游，做着自己想做的一切来拓展自我的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

除了描述英国守旧落后的维多利亚时期之外，作品中也不乏对美好自由新社会的描写。在此，埃莉诺有了相对自由的活动，在她出游的同时还外出做义工，与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尤其是同低于自己阶级的人相处。这体现了新社会所特有的自由与平等。从职业观来看，新社会的人们大多过着独立自主的生活，有了更多的选择。佩吉作为战后新一代女性的代表，有着作为女医生的职业、未婚、经济独立。作为牛津大学教授之女的吉蒂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女商人，有一份在剧院里的工作。而作为男性代表的诺斯，去往了英国的殖民地—非洲服务，从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被看做是新社会多元化特征的体现，人们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了。从受教育的程度上来看，这个时期的人们无论男女几乎都有受教育的机会，他们拥有了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自由权利。受过大学教育的佩吉便是个很好的例证，她想象力丰富，思想新潮独特。博学多才的她毕业后找到了体面的工作，实现了自我在社会中的价值。

很显然，小说描写独立自主的现在，是为了与顽固守旧的过去作对比。然而这种过去与现在的对比是不稳定的，因为并非每个人都对现在十分满意，至少第二代人中的埃莉诺、帕特里克等人就对现在仍有不满，且经常回忆过去的生活。比如在故事的第八部分，马丁与萨拉外面午餐时，当萨拉开始读祷告书中的内容时，马丁叫她停下，因为旁边有人在听。而正当马丁说起他极不情愿地被征入伍时，萨拉又立马打断他，因为旁边有其他人在听（Woolf :177）。看来，新社会的人们并未享有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在故事最后一部分中，当埃莉诺带佩吉去参观以前的老房子时，眼前浮现了对过去的无限回忆与留恋。她希望自己能回到过去那有趣的，安全的八十年代，但这一切在她看来是美好却不真实的（Woolf :255）。显然，埃莉诺并不是真心想要回到过去，她时常对过去的回忆实际上是对现在的逃避和否定。在迪莉娅所举办的聚会上，迪莉娅感慨道：“英国是个多么富有的国家啊！”帕特里克也说道：“大英帝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文明的国度。”（Woolf :304）可见他俩对旧社会时期的英国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但这也进一步表明了人们对战后生活的不满与逃避。小说一方面塑造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美好现在，一方面又告诉读者这种现在充满了弊端与矛盾，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小说文本的分裂性。正如解构主义批评家们所说，“文本自身具有矛盾性和颠覆性”，任何文本都是不确定的，均表现出一种自我分解的性质。所以，是小说本身解构了封建保守的过去与自由独立的现在的对立，而过去与现在之间界限又具有不确

定性，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过去的特征——不平等、少亲情，所谓美好自由的现在在文中只不过是人们美好的愿景而已。此外，文中还多次提到了“新世界”这一概念，最初是在埃莉诺与尼古拉斯的第一次谈话中提出的。“有关新世界…”她大声说道。“你认为我们的生活将会得到改善么？”埃莉诺问道。接着，埃莉诺又问道：“但是，我们该如何改善生活…让我们活得更自由…更好…我们该如何做是好？”她降低了声调以免吵醒身旁熟睡中的人（Woolf :255）。在他俩如此激动且兴致勃勃的讨论中，不难看出“新世界”在此指代的是人们心中对和谐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虽然生活在以独立自由著称的新社会，心底却仍然对这种不确定的现实表示不满，依旧对所谓的和谐美好的世界充满向往。但他们对“新世界”这一概念所代表的社会也不能给以确切的实现年限，说明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对意义的不确定，以及对终极意义的否定正好是对解构主义中延异这一概念的最佳诠释。对“延异”这一概念有两个方面的指示意义，一指时间上的推迟，二指空间上的差异。它揭示了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认为文本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和环境的变化不断延异的

（周蓉蓉：1）。延异是一种不稳定的语言思想，它代表着意义的不断消解。这就解释了《岁月》中人们对代指美好生活的概念一再改变，却无法确定的原因。因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定义也是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对概念定义的不确定性也可以说是一种对其所代表的意义的消解。

在《岁月》这部家族式的小说中，伍尔夫描绘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讲述了女性为争取平等权利所付出的艰辛及由此取得的巨大进步，讨论了新形势下两性关系的和谐发展（段艳丽：1）。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正如小说开始讲述的被束缚在病床上的母亲：“她躺在凹陷的枕头上，一只手放在面颊下，轻轻地呻吟着，仿佛她在一个即使在梦境里前面的道路上也依然布满了障碍的世界里漫游。”（Woolf : 17）这里描述的是一个为家庭操劳了一辈子的母亲形象，从其表情中可得知：她一生都深受束缚，毫无自由可言。而与之相比，她的丈夫却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这位老兵可以去俱乐部找人喝酒聊天，甚至还可以去找情妇寻欢作乐。而到了第二代妇女，她们的选择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开始有了一定的自由。埃莉诺在父亲离世后，卖掉房子，去往各地旅游。他摆脱了父权制生活的束缚，可以做任何自己喜欢的事。第三代女性则更自由了，想象力丰富的佩吉有着新潮独特的思想，她比以往任何一代女性都更具有批判性和攻击性，敢于用言语和行动来维护女性自我的权利。再从学校教育这块来看，在埃莉诺那一代，学校几乎就是男性的专属地，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正如小说中帕吉特上校对其子女学习的态度的区别一般，他认为女儿迪莉娅去上音乐课是在浪费钱，而对于成绩有所进步的儿子马丁则给与其六便士以作奖励。但第三代的佩吉则拥有同男性一样的受教育权，并学会了用自己所学得的东西为自己辩护。此外，我们还可以从职业观的角度来分析，小说中以埃莉诺的母亲为代表的第一代女性几乎就是男性的附庸，她们的职责就是做贤妻良母。

而到了埃莉诺操持家务的时候，他的弟弟们都外出工作：莫里斯成了法官，爱德华成了牛津大学的教授，马丁则成了军人，这些都是埃莉诺望尘莫及的。但第二代的女性中也不乏独立自主的女性，牛津大学教授之女吉蒂就是一位争强好胜的女强人，她拥有一份在剧院里的工作。而他们当中极具冒险精神的罗斯，作为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表，她参与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妇女运动的第一次浪潮。正是经过了第二代妇女们的努力，以佩吉为代表的第三代女性才能够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工作，从而可以像当时的男性一般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由此可见，小说描写了从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到男女两性和谐平等的过渡。小说最后描写男女两性在自由空间上，受教育的权利上，以及工作的权利上达到了互补相融的程度，表明文本自身对男女两性不对称的二元对立的消解。《岁月》中起初描写的男性和女性间的对立就是不稳定的，它引发了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兴起，这也就预示着男女两性间的二元对立终将消解。但伍尔夫在小说中的安排暗示我们：寻求女性解放，并不是要女性凌驾于男性头上，也不是要女性失去固有的温柔，变得和男性一样。而需要两性相互映衬而存在，因为无论哪个性别都是不完美的，都是有缺陷的（段艳丽：5）。从伍尔夫的女权主义观中，我们可以得知，她是主张男女平等，强调男女差异的。她意识到世界由男女两性构成，只有男女对话与融合才能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这正是伍尔夫“双性同体”思想的具体体现，它一方面解构了男女两性的二元对立关系，一方面使妇女突破性别偏见，为社会创造出更高的价值（沈渭菊：2）。因此，她的这种双性同体思想既避免了传统的父权制的继续，又消解了两性间不稳定的对立关系，同时还避开了当今一些极端女性主义者提出的女性中心论的观点，她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多元化的、开放的思维模式，是顺应当代社会历史环境的。

《岁月》中一个重要的空间线索是“伦敦”，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地名，而是英国的现代文明与传统闻名交锋的战场。伍尔夫在此描述的正是英帝国主义由殖民扩张的鼎盛走向衰落的时期，而伦敦作为大英帝国的首都，是当时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因此“伦敦”这一地名在小说中顺理成章地担当了英帝国主义的象征（沈渭菊：2）。而那座一度人气鼎盛的老房子则是伦敦这一空间里的主轴，作品中莫里斯上班的法庭，帕吉特弟弟迪戈比·帕吉特家，萨拉、麦基的住所，以及茱莉亚布置的宴会厅等其他空间场合则是围绕着“老房子”这根轴在转换变动着的。

从时间来看，作者按编年史的方式，描绘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到20世纪30年代间普通民众的生活。文本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打破了时间的线性发展，使时间在过去、现在与未来融会。这是一种淡化故事情节，在同一时间内展现不同人物意识的共时性写作。在这种意识流的叙述中，还夹杂有些许的倒序成分。在小说的最后一个部分中当埃莉诺回顾自己的一生时的心理描写就运用了倒叙的叙事技巧。如“我的一生几乎是为别人而活的，为了我的父亲，为了莫里斯，为了我的朋友，为了尼古拉斯……。顿时与尼古拉斯交谈时的片段涌上她的心头（Woolf：281）”。又如，当萨拉重新在诺斯面前提及诺斯信中的内容时，诺斯似乎

又回到了非洲农场上，似乎又看了曾经那个年轻却孤独的自己。这种叙述技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进一步地打乱了文本的时间顺序，使小说中人物的意识之流具有更大的跳跃性、随意性。

《岁月》这部作品中游走着两条主线，一条是以时间为轴叙述从1880年到1981年间帕吉特家族中发生的事情，一条是以物理空间和心理空间结合而成的空间为轴的叙述。在这里，时间与空间的对立是不稳定，不清晰的，因为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两者是相互依赖而存在的。《岁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人物在变化着的空间场合穿插上演，起初是在帕吉特上将的家，接着转移到了莫里斯上班的法庭，而后又随着帕吉特上将转移到了他的弟弟迪戈比·帕吉特家，紧接着跟随萝丝来到了萨拉和麦基的住所，后来又随着埃莉诺转移到了莫里斯在西班牙的家，之后又随着埃莉诺回到了她在伦敦的老家，就此又转移到了凯蒂的派对上，后来又随埃莉诺来到了麦基婚后的家中，最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聚集到了迪莉娅所布置的宴会厅。期间，每一地点所发生的事情都发生在一天时间里，这表明：空间可以超越时间，而时间也能包容空间。再如，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空间基本上是在家庭之内，没有公共空间。《岁月》中，“窗户”这一意象就表明了当时女性对于自由空间的渴望。“米莉和戴利亚只能悄悄站在客厅窗帘后偷偷注视着年轻男子进邻居的屋子”，“一个妇女将头探出窗外四处张望”等都足以证实这一点（段艳丽：2）。但是随着时间的递进，新社会的到来，女性的自由空间渐渐扩大。特别是以佩吉为代表的第三代女性，她们拥有自己的职业、未婚、经济独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时空间存在一种正相关的联系，同时也表明了文本自身对时间与空间二元对立的消解。

伍尔夫作为主要的意识流作家之一，在时间观念上，她侧重心理时间的描写。心理时间代表往昔记忆、经验与现实沉思和未来畅想的交叠，是内在意识无尽的“绵延”（李萌萌：2）。在意识流小说中，时间是不确定的、朦胧的、无序的，空间在颠倒的时间中成为碎片，作者在这颠倒的时序中展示颠倒的意义（刘加媚：5）。意识流小说不受时空的束缚，不按照客观时空顺序创作。它将人物从时间顺序中解放出来进入各自的心理空间。下面我试着分析下意识流在诺斯这一人物身上的应用，全文对诺斯的心理空间的构造是根据人物的心理时间跳跃性的将回忆、现实、与想象穿插起来的。当诺斯开车在伦敦街上游走时，他的心思开始转回到他在埃莉诺家聚会时的场景。而当他看着正在跳舞的人时，他的心理空间又开始从眼前的事物无限延伸，开始想象另一种背景……（Woolf：284）。当诺斯目睹了他眼中所谓的混乱的物质世界时，他又开始怀念小时候平淡而纯真的生活。入睡后，他又梦到了一幅山水田园般的画面，以及自身与大自然的融合，此处的意识流描写寄予了诺斯对内心自由的向往（Woolf：323）。如此看来，叙述者为人物构造了三个叙事维度，分别是诺斯的现实生活、他所回忆的过去、以及他想象中的世界。人物的思想将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层面统一到一起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心理意识空间。此处的时间很短暂，甚至只停留在那么一瞬间，而人物的心理空间却进行了全方位的位移。文本自身的描写消解了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界限，

把三种时间重叠在一个物理时刻，把不同的空间并列在一个时间点（刘荡荡：6）。这表明了时间对空间的超越，空间对时间的体现。此外，本来时间是有先后性的，但作者在意识流描写中却统一采用过去时把他们置于同等的地位，让人物的心理空间与现实中的时间共时。这再一次摧毁了时间与空间的壁垒，将时间与空间融合起来。《岁月》这部意识流作品割裂了时间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将时间转换成空间，把一切彻底空间化，正是通过这种形式，作品才消解了时间与空间的二元对立模式。

总之，《岁月》一文主要向我们讲述了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其中，伍尔夫对女性的地位转变做了较好的诠释。在小说的进程中，我们发现过去/现在，男性/女性，时间/空间这三个主要的二元对立概念在文本中都能找到相互融合的因素，说明这些二元对立是不稳固的、摇晃的、不成立的。这也许就如人们对“新世界”这一概念的憧憬一般，是飘渺、模糊、多变的。

参考文献

- [1] Frank, Joseph : *Spatial Form in Modern Literatur*. Trans Qin Linfang, Beijing: Peking UP, 1991.
- [2] Jeffrey R. Smitten and Ann Daghistany, eds. *Spatial Form in Narra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 [3] Woolf, Virginia. : *The Years*. San Diego: Harvest /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69.
- [4] Woolf, Virginia. : *A Room of One's Own*.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 [5] 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商务印书馆,1998年。
- [6] 段艳丽:《从〈岁月〉看英国女性五十年间主体地位的变化》。河北: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年。
- [7] 克里斯蒂娜·豪威尔斯:《德里达》,(张颖,王天成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
- [8] 李海英:《论〈洛丽塔〉的解构主义倾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
- [9] 刘加媚:《现代主义小说与后现代主义小说之比较》。广西: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
- [10] 李蓝玉:《乔伊斯与伍尔夫意识流小说创新形式的对比研究》。黑龙江:黑龙江社会科学,2011年。
- [11] 刘琴:《〈沉没之鱼〉的解构主义阅读》。广西: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
- [12] 梁雪霞:《〈岁月〉:弗吉尼亚·伍尔夫对生命格律的探索》。浙江: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
- [13] 李杨:《弗吉尼亚·伍尔夫生活作品的精神分析解读》。山东:山东大学学报,2012年。
- [14] 乔雪瑛:《〈夜色温柔〉的解构主义解读》。《世界文学评论》,2009年。
- [15] 沈渭菊:《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和谐统一探究弗吉尼弧·伍尔夫〈到灯塔去〉中的双性同体思想》。甘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
- [16] 沈渭菊:《建构下的解构——〈海浪〉的后殖民主义解读》。甘肃: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9年。
- [17] 唐盼:《意识流背后的女性主义解读——从弗吉尼亚伍尔夫说起》。《青年文学家》,2012年。
- [18] 童晓燕:《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解构主义解读》。沈阳:沈阳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
- [19] 伍厚恺:《弗吉尼亚·伍尔夫——存在的瞬间》。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

- [20] [法] 雅克·德里达：《汪堂家译论文字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
- [21] 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
- [22] 周蓉蓉：《〈李尔王〉译本在解构中延异》。安徽，铜陵学院学报，2004 年。
- [23] 朱艳阳：《伍尔夫小说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社会科学论坛》，2010 年。

A Deconstructive Analysis of *The Years*

Zhou Shuang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1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Virginia Woolf's *The Years* from Derrida's deconstructionism, and embodies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Logos- centralism. This paper further deconstructs the mode of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males and females, time and space. Some meanings in this paper are multiple and changing. The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econstructionism have found a new way to analyze Woolf's works.

Keywords: *The Years* deconstructionism binary opposition uncertainty

作者简介 (可选):周双, 湖南大学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